

总主编 吴敏先 阎海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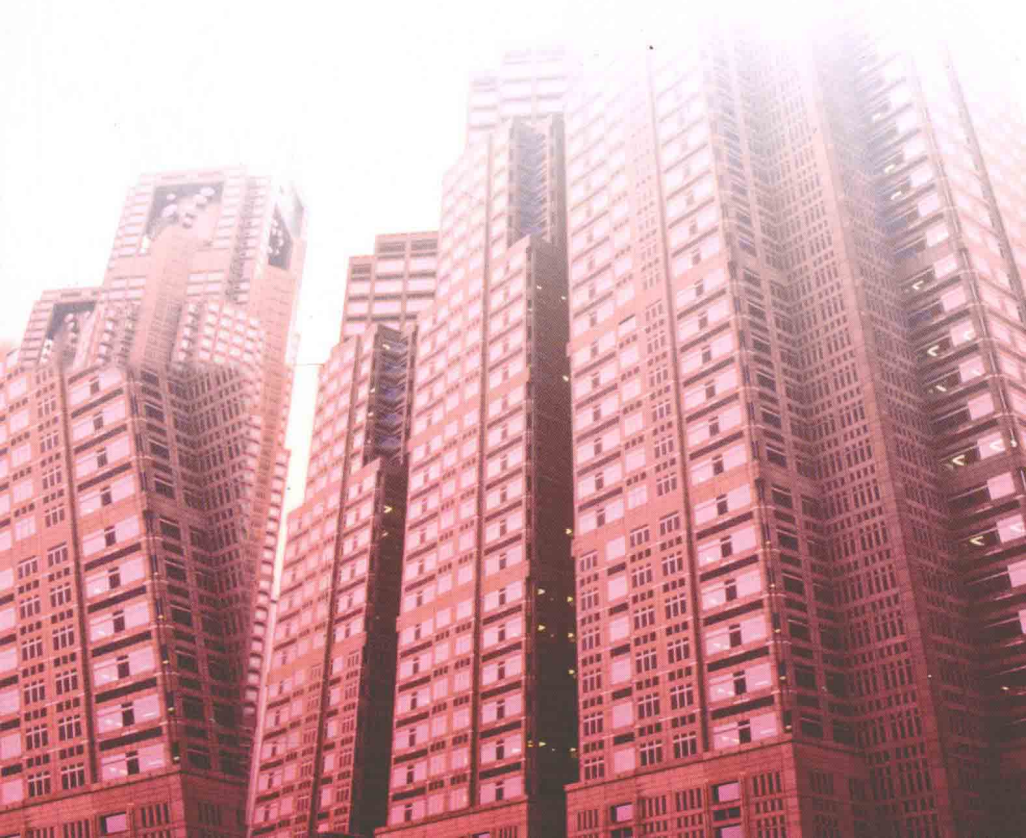


共和国辉煌历程

改革开放

主编 / 毕秀梅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主编 吴敏先 阎海涛

共和国辉煌历程

改革开放

主编 / 毕秀梅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名单

主 编	毕秀梅	
副主编	陈 前	
作 者	毕秀梅	陈 前
	邹世允	张立艳
	张学凤	

目 录

第六篇 春回大地

第一章 徘徊前进·····	(687)
一、揭批“四人帮”·····	(687)
二、邓小平复出·····	(695)
三、国家的安定与复苏·····	(700)
第二章 伟大转折·····	(708)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708)
二、中央工作会议·····	(729)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739)
第三章 拨乱反正·····	(747)
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747)
二、经济上拨乱反正·····	(751)
三、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关系调整·····	(758)
四、《历史决议》与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	(765)
第四章 改革起步·····	(777)
一、农村改革的兴起·····	(777)
二、城市经济改革的启动·····	(783)
三、政治体制初步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	(791)
第五章 宏图大展·····	(800)
一、党的十二大召开·····	(80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订和全国人大 六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806)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815)

第七篇 革故鼎新

第六章 改革新篇	(827)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827)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837)
三、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	(846)
四、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改革整编的成就	(853)
第七章 发展大潮	(859)
一、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	(859)
二、中共十三大的召开	(869)
三、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	(878)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	(886)
第八章 开放格局	(895)
一、特区的建立	(895)
二、开放格局的全面推进	(909)
三、海南建省	(917)
四、浦东开放	(923)
第九章 一国两制	(929)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	(929)
二、港澳踏上回归路	(936)
三、两岸关系新变化	(946)
第十章 广交朋友	(954)
一、对外政策的调整	(954)
二、外交理论的新发展	(959)
三、广交朋友	(964)
第十一章 经受考验	(975)
一、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	(975)
二、政治风波	(983)
三、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988)
四、在保持稳定中开拓前进	(991)

第六篇

春回大地

第一章

徘徊前进

一 揭批“四人帮”

1976年10月，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事实上结束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揭发、批判和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摧毁其帮派体系和残余势力。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因此，在1976年10月6日晚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当晚发出紧急通知，请在京政治局委员立即上玉泉山开会。10月7日，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了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的议程，一方面要宣布对“四人帮”的决定，另一方面要确定党中央主席的人选，商议是由叶剑英还是由华国锋主持提交会议讨论的决定。10月6日晚11时，政治局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11人全部出席。华国锋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及时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10月6日晚8

时，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叶剑英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四人帮”被清除以后，世界各国、全国各省都在看着我们。毛主席常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我们工作做好。其他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代表党中央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断行动，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会议一致推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议从6日晚8时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整整一个通宵。并于7日至14日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四人帮”的问题，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要求在斗争中注意政策。^①

在打招呼会议期间，中央做出决定：撤销王、张、姚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去上海市主持工作，接管了被“四人帮”一伙长期控制的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0月14日，党中央向国内外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随后，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收集其罪行材料。10月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中列举了毛泽东自1974年2月以来对“四人帮”的批评，通报了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和党中央断然处置的措施。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斗争。

11月15日至19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对揭批“四人帮”工作做了部署，决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几个揭批战役，分别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理论，逐步深入地进行批判，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

^① 汤应武：《1976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人民战争。

按照上述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三个战役逐步深入开展。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这批材料主要是揭露和批判江青等人如何搞分裂党的宗派活动，组织反革命的帮派体系，提拔亲信、重用坏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公布了江青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及陷害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公布了自1974年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及其他一些场合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一些谈话，这些谈话是当时批判江青集团的主要思想武器。这些材料有力地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以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为中心的第一个战役。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公布了“四人帮”在个人或家庭历史方面的罪证材料，运用大量材料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党组织长期隐瞒了他们本人或家庭在历史上的政治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结党营私，钻进党和国家领导核心，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随即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中心的第二个战役。《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登载了许多有关的批判文章。广大干部群众结合罪证材料，翻阅了大量历史材料，集中知情人提供的证据，向中央揭发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他们表面上标榜是“最革命”的，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按照既定方针

办”的忠实“接班人”，实际上，他们是一伙阴谋家、野心家。

在揭批斗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根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党章规定，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做出组织处理，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反革命阴谋集团，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中央的这一决定，神州九亿人民拍手称快，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揭批的积极性，一些深受其害的单位在全会公报公布的当晚就集会声讨“四人帮”，全国迅速出现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高潮。同时根据斗争和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调整和加强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加强了中央党、政、军一些部门的领导，逐个地研究和解决这些地区和部门的问题。

在揭批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发动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党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哲学、经济、政治等方面纠正被其颠倒了路线、思想、理论是非。同时，党中央又揭批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全面系统地清除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在揭批“四人帮”第一、二个战役的基础上，把揭批斗争同理论观点的正本清源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揭批了“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种种极左表现。

通过这一阶段的揭批斗争，初步分清了一些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和政策是非，并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当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在揭批“四人帮”中联系批林彪提上日程。这是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一项战略步骤。

(一) 林彪同“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他们妄图搞乱中国，乱中夺权，本质上是一样的。林彪和江青相互吹捧。早在1966年4月，林彪就委托江青在部队搞文艺座谈会纪要。江青则妄图盗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要请“无产阶级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破坏活动的开始。此后，林彪和江青等“四人帮”共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整死老干部。他们反军乱军，共同挑起武斗，“全面内战”；他们否定中共中央正确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占主导地位，又仇视公安机关等等。在揭批“四人帮”中联系批林彪，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 “四人帮”为林彪百般辩解、包庇，继承和发展了林彪的极“左”路线。在举国批判林彪出逃叛国的罪行时，“四人帮”怕露出马脚，竭力保护自己，对揭批林彪划框框、定调子、设障碍，不让群众深批狠批。如果要批林彪，也只批“两头”，不批中间，即前批林彪的历史，后批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571”工程纪要》，而对林彪的反革命路线捂住不批。但是林彪的罪行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对林彪的路线加以清算，许多事情就找不到根子，许多有关路线是非问题就搞不清楚。由于过去对林彪没有怎么批，使不少人对林彪那一套缺乏正确的认识。当“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推行这条路线时，就辨别不清，抵制不力，甚至受骗上当；有的人则在林彪一伙失败后，投靠了“四人帮”，这就是没有批透林彪的后果之一。所以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路线是非有重大意义。

(三) 林彪、“四人帮”都打着“高举”、“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其目的是篡党夺权。尽管林彪、“四人帮”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实质都一样，都是假“高举”，真反对；假“紧

跟”，真背叛。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是揭批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做，不仅把揭批运动推向深入，而且有的部门还进一步挖出了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分子，有利于摧毁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采取种种手段，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帮派体系。这个体系散布于许多地区和部门，篡夺了一部分领导权，有的在“四人帮”倒台后，仍占据领导岗位。他们一方面制造谣言，转移斗争方向，转移或销毁罪证。另一方面，“捂盖子”，保自己，散布“错误人人有份”的言论，企图拴住群众，破坏揭批斗争。这些人严重地威胁着群众，许多人不敢说话，一些过去与“四人帮”或帮派体系篡党夺权活动有联系，干过一些错事、坏事的干部群众就不敢揭批，对问题遮遮掩掩。因此，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清查与他们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就成为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必要措施。同时，清查工作也是一项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涉及的面要比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宽得多，而且也危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权利。因而在清查中出现了相当激烈的清查与反清查斗争。如有的人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有的以清查为名，行夺权之实，等等。为了较好地开展清查工作，扫除障碍，党中央要求在揭批过程中，对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件件、一桩桩查清楚。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揭露和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教育和挽救那些在斗争中犯有错误的人。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各级领导多数立场坚定，头脑清

醒。他们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牢牢掌握思想武器，对那些被夺了权的单位，毫不含糊地把权夺回来；对那些领导不力的单位，及时整顿和加强领导班子。同时，引导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实行清查与揭批相结合，发动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清查了反动帮派头子和骨干的罪行，把他们干的罪恶活动彻底揭发出来。在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同时，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少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一些“四人帮”的骨干受到很大震动，开始转变态度，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一些犯严重错误的人，大都转变立场，讲清问题，放下包袱。

经过两年的清查工作，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被查清了，他们的帮派体系被摧毁，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也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手中。据统计，在当时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因而被撤换的有9人。同时，中央初步调整了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及23个部、委、局的领导力量。^①到1978年底，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然而，随着揭批斗争的逐步展开和深入，特别是进入揭批斗争的第三个战役，主要从思想、理论和路线上深刻揭批“四人帮”的谬论和错误时，揭批工作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几乎难以深入进行。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此时，广大干部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这种要求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

^① 孙大力、黄如军：《新的起点——1978年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作；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是这两件事都是经过病中的毛泽东同意和批准，由“四人帮”一手制造的。因此，要给这两件事平反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不能不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华国锋却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华国锋虽然为粉碎“四人帮”作过重要贡献，其后他在领导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却延续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两个凡是”方针即是这种指导思想的集中表现。1977年2月7日，根据华国锋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两报一刊的形式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有针对性的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方针的提出，不仅妨碍了揭批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同时也在人们的思想上设置了种种禁忌。

尽管有着这样的思想禁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仍积极参加揭批斗争，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使得历时两年多的揭批运动取得了基本胜利。主要表现在：（一）通过揭批斗争，广大干部群众基本上分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初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二）基本上查清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摧毁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三）及时的对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四）我党长期奉行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逐渐恢复。（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此外还平反了一部分干部的冤假错案，解脱了一批干部，使他们重返领导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局和各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力量。

上述几方面的胜利，为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创造了条件。

二 邓小平复出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一年他73岁。邓小平的一生“三落三起”，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被打倒是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由于执行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受到了推行“左”的错误的临时中央的批判斗争。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打倒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遭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并于1969年至1972年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三年。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1976年，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76年，邓小平72岁，在一般人看来，邓小平的政治生命恐怕也就到此停止了。然而，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他老年的岁月中谱写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乐章。

但是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冲破了种种障碍后才实现的。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党内外同志都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这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和可能。

1977年1月8日，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这一天是周恩来逝世的周年纪念。人民通过大字报、诗词、标语等表达对周恩

理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北京重型机器厂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工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①。大字标语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当时最为关键也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在北京、在全国都引起了震撼。

其实早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叶剑英就向中央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②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进行，人们越来越迫切地希望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看到邓小平熟悉的身影，盼望他能早日出来主持工作。

面对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华国锋一方面同意有步骤地解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两个凡是”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严重桎梏。这个方针违背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在事实上阻挠了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此深感忧虑。

叶剑英几次找华国锋申明自己的意见：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的绝

^① 孙大力、黄如军：《新的起点——1978年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党的文献》1995年第一期。